

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

叶文宪 聂长顺/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

叶文宪 聂长顺/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叶文宪、聂长顺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004-8069-3

I. ①中… II. ①叶… ②聂… III. ①封建社会—中国—文集
IV. ①K230.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5040 号

责任编辑 雁 声
特邀编辑 纪 宏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75 插 页 2

字 数 418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中国，“封建”这个词早已有之，它是“封邦建国”的简称，几千年来谁也没有用错过。然而一百年前当严复把西文的 feudalism 翻译为“封建”以后，因为中国的“封建”与欧洲中世纪的 feudalism 形式相似而内涵不同，时间更不对应，（严复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在三代，迄于周末；西欧的封建制始于八九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唐宋之际），所以麻烦就接踵而至。再过几十年，当五种社会形态单线递进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被引进中国以后麻烦就更大了：中国固有的“封建”被叫做“分封”，明明是“废封建立郡县”的集权专制王朝被叫做“封建王朝”，明明是租赁经营的土地关系被叫做“封建经济”，明明是按宗法血缘构建起来的社会被叫做“封建社会”。从此以后，“封建”就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贬义词，一切坏的东西都被冠以“封建”二字，“封建”的概念被混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有前辈学者愤愤然道：“语乱天下”（侯外庐语）、“削足适履”（钱穆语），然而在舆论一律的年代，他们的呼声被淹没在一片“泛封建”的言说中而未能被人闻达。

30年前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思想界、学术界也思潮涌动。尽管阻力重重，但是学者们的思想和良知是压抑不住的。1991年日知（林志纯）先生发表了《“封建主义”问题（论 feudalism 百年来的误译）》一文，提出把 feudalism 与中国古代的“封建”对应起来是一个误译。此后，学术界关于“封建”问题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近年来已经成为史学界一个新的热点。2006年2月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问世，他以一本将近40万字的专著考证了“封建”一个词的来龙去脉，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从而把关于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最近三年围绕着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连续开了三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2006年10月的武汉会议、2007年10月的北京会议和2008年12月的

苏州会议。这本论文集就是递交苏州会议的部分论文的汇编。武汉会议后冯天瑜先生对他的《“封建”考论》进行了修改补充，字数增加到52万字，第二版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苏州会议前后，他再次进行修订，新的修订版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一个天天挂在大家嘴边、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词受到学者们如此认真慎重的讨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关于“封建”的问题是多么的重要。

首先，厘清“封建”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一个关系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问题。中国古已有之的“封建”一词的内涵是很明确的，严复之所以把它与feudalism对译，是因为看到了两者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如果仅仅如此，我们倒是可以把商周称为封建时代的。然而五种社会形态单线递进说给“封建”一词注入了新的内涵，又说中国固有的“封建”不是封建而是分封，再说中国的“封建”与欧洲的feudalism不同，结果把中国的“封建”倒译成feudalism后外国人就看不懂了，因为这样一来，中国的“feudalism”和欧洲的feudalism就大相径庭了。如果中国从秦到清的社会形态不是封邦建国，那么为什么非要用“封建”这个词呢？如果一定要在这个名词里面注入新的内涵，那么必须注明是“封建1”、“封建2”还是“封建3”，否则岂不犯了混淆概念的低级错误吗？历史学号称自己也是一门科学，如果连最基本的概念都含混不清，那么它还怎么能够成为科学呢？

其次，厘清“封建”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是一个循名责实的问题，而是要从“封建”的名实问题入手，进一步搞清楚所谓的“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封建”本来是指“封邦建国”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是商周王朝的特色，从汉到清的历朝历代都分封藩王，但主流是官僚政治、地主经济，而非贵族政治、领主经济，故不能把从秦到清称为封建社会。

究竟什么叫做“社会形态”？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我们究竟应该按照社会的结构来命名呢？还是按照政治制度来命名呢？抑或按照经济制度来命名呢？还是按照文化特征来命名呢？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所用的五个名称是荒谬的，因为它们是既非同一层次又非同一种类型的概念，把这样五个社会形态排在一起，本身就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即使人类社会可以分为这样五种形态，它们也是兼容并存的，并不一定要相互排斥先后替代。比如我们把侏罗纪称为恐龙时代，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地球上只有恐龙，只不过是因为恐龙特别惹眼而拿来作为时代的标志而已。恐龙灭绝以后爬行类动物依然存在，当今世界从最

低等的单细胞动物到最高等的灵长类动物都并存在同一个地球上，虽然人类主宰着这个星球，但是全世界老鼠的数量比人还要多，全世界蚂蚁的总重量比人还要重，我们又该如何来命名这个世界呢？传统史学是鉴戒史学，是为帝王统治服务的，所以它以改朝换代为主线，以王朝的典章制度、政治经济军事为研究对象，而新史学是社会史学，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所以它要研究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等。社会是一个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极其复杂的系统，很难用一个词概括出它的全部特征，试图用一个词来说明一个社会是徒劳的，重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各个时期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的内涵。

最后，通过研究“封建”与“封建社会”，我们要重新建立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古以来人们提出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发展规律：摩尔根根据文明程度把人类社会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时代，柴尔德根据制造工具的材料把人类社会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个时代，这些都是历史进化论的代表学说；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象征性地把人类社会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孔子认为人类社会是从公天下的“大同”变为家天下的“小康”，这些都是历史退化论的代表学说；邹衍神秘兮兮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同样神秘的黑、白、赤“三统说”，《三国演义》卷首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些都是历史循环论的代表学说。司马迁精通天文历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虽然没有说出社会是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坏，但是他肯定社会是周期性变化的。不管这些看法正确与否，说明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着社会发展的规律。人们寻求社会发展规律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解释过去，更是为了预测未来和企图控制社会的趋势。人们总是相信世界的演变是有规律的，也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其实“自然规律”也好，“社会规律”也好，都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认识。因为“自然规律”只是人们对自然法则的一种认识，所以人们提出来的“自然规律”就不断地被改写，“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然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同的地方在于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在社会上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因为在冥冥中受到“规律”的制约与支配，人并不是在社会的棋盘上被用来实现历史发展规律的棋子，恰恰相反，历史是人类自己创

造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里说：“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② 他们的这些论述都是对崇拜简单模式的史观的最好批判。如果社会的发展是必然模式的推演，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而奋斗而只要服从和等待就可以了。

有人把对“封建”与“封建社会”的研究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对‘封建’名实以及秦以后是否封建社会的讨论，从来就不仅仅是书斋中的问题和单纯的概念之争，而是涉及肯定还是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肯定还是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当前有关封建的讨论，其指向实际上是政治而非学术的。”“现在不少学者讨论封建名实问题，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其实质是借着‘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来去除封建社会形态，即否定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③ 校正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的概括，怎么就成了“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这种批评逻辑真是匪夷所思！须知，孙中山等民主革命的先驱，从来就不赞成以“反封建”概括中国的民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反对把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前近代社会称为“封建”（因而在马、恩那里，“反封建”一说是不能成立的）。难道孙中山、马克思、恩格斯也在“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至今还有人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而且对政治标准的科学性肆意歪曲，实在令人感到学界惰性之严重。

韩非子曰：“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显学》）当今中国史学界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观点见解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大家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最多是顾左右而言“后现代”，却没有一个人敢说己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有些人明明已经把马克思的思想曲解了，还要坚称自己是“正宗”，并且编造出一套传承马克思主义的道统体系来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237页。

③ 朱昌荣：《“‘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研讨会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证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嫡系真传，却把复原马克思本义的论说称为旁门左道。

荀子曰：“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非相》）“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俗儒“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儒效》）“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王制》）先王与后王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但是先王所处的时代与后王所处的时代不同，因此他们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有时甚至还互相对立，那么我们应该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呢？有人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来论证由五种社会形态单线递进说推演出的近代中国“半封建”说的正确^①，这是十分牵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递进说是不科学的，泛化的封建观名实不符，而且，按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中国怎么可以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再退回到“初级阶段”去呢？按照五种社会形态单线递进说，改革开放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又是什么呢？如果社会的发展不是多元的而是只有五种形态依次更替这样一种模式，那么所谓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以解体前的苏联为模板呢还是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为模板呢？如果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关于“封建”与“封建社会”的研究不会因为出了一本书、开了三次会就得到解决的，关于这个问题还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一本书、三次会只不过是拉开了一个序幕而已。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我们相信通过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总有拨开迷雾、水落石出的一天。到了那一天，一部中国历史将按照一种全新的框架重新书写，全社会的话语体系也将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并将为之而奋斗。

叶文宪

2009年3月于苏州石湖

^① 见李根蟠《“封建”名实析义》，《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

目 录

序	叶文宪(1)
请为“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松绑!	刘志琴(1)
实事求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究竟能否成立为中心的探讨	王 和(8)
跳出樊笼求真我,皇帝原本未穿衣	
——中国社会史分期的另类视角	高 钟(23)
马克思所理解的封建制	
——读马克思关于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 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	张奎良(34)
走出单线直进史观误区	
——以中国“封建社会”定位为例	冯天瑜(51)
“封建”:旧话重提,意义何在?	
——对“封建”名实之争的理论探讨	黄敏兰(67)
“封建”与“Feudalism”的相遇:“概念变迁”和 “翻译政治”的初步历史考察	潘光哲(104)
“封建”是什么?	叶文宪(133)
封建概念考辨	葛志毅(155)
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	
——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发展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荣 剑(162)
浅析清代封建论的文化意蕴	田勤耘(192)
“封建”的泛化与将错就错的“封建”论	
——以郭沫若等人的泛化封建观为中心	郝祥满(206)

“封建”话语的叙述想象	吴宗杰(221)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通史的体系建构	朱洪斌(234)
中国封建社会的由来及其早期形态	张广志(249)
封建与大一统之间	陈启云(257)
论封建制与郡县制	叶文宪(263)
公私视野下的明末封建、郡县之辨	沈 华(278)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	孟祥才(288)
地主也是农民	束江涛(294)
从经济史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实质	
——以李剑农“封建社会”论为例	余来明(303)
试论中国专制时代的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	束江涛(313)
封疆双剑	
——欧陆的封建秩序	刘正中(329)
关于“封建”的中日对话	
——谷川道雄、冯天瑜讲谈录	聂长顺(339)
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	
——读冯天瑜《“封建”考论》	张绪山(346)
一个概念一本书	
——读冯天瑜先生新作《“封建”考论》	方维规(357)
《“封建”考论》修订版结语	冯天瑜(363)
春秋读书社第 49 期讨论	
——读冯天瑜《“封建”考论》	(370)
“封建”问题综述	秦 黎 徐 娟(375)

请为“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松绑！

刘志琴

“封建社会理论研究”不是我专业研究的内容，可作为史学工作者又不能不关注，因为这是有关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问题，而这种关系长期以来曾经是横置在学者头上的一把利剑，多少人为此遭受批判，打入另册，甚或令人钳口结舌，放弃学术追求，至今仍然使人叹息。正因为震慑于过去的悲剧，感动于今人对学业的追求，不得不写下我的认识和感受。

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中最具有全局性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有五大理论热点，即中国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号称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每个问题都有学术见解的不同，又无一例外地将不同意见归结为唯物和唯心两家，几乎都笼罩着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阴影，很难展开自由讨论。自改革开放以来，对此类问题的既定结论就不断引起反思。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拨乱反正初期，农民战争研讨会首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对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唯一动力的结论已有松动；80 年代初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讨论会，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新的思考；天津南开大学的学术讨论会提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质疑；有关土地制度等问题，在史学界也多有新的论证。1986 年《读书》杂志第 11 期发表何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一文直接叫板“封建”基本概念问题，认为以分封诸侯建立王国为

特征的封建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废除，从实行郡县制后，继续沿用“封建”概念认识秦汉以降的社会性质，积非成是，是荒唐现象。90年代又有日知和李慎之等学者再次提出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经济制度套用于中国古代，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五朵金花面临新的检验，这是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学术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这些问题的提出或重新思考，对读者是耳目一新，甚或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由于缺少重量级的著作，并不足以发生全局性的影响，因为要改变一个习已成规的思维定势，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深入的研究和翔实的论证，这就需要时间来积累成果，难得的是2006年冯天瑜先生出版40万字的《“封建”考论》，对中外古今“封建”概念的由来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认为汉语的“封土建国”与西方的“封土封臣”虽有通约性，但将秦汉以后的两千年，称之为封建时代，违背了汉词的本义。由于史学研究关键语的失准，使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失却构制的纽结，有必要正本清源，建立新的范式，主张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一说。2007年又扩充到52万字再版。这一重头著作一问世，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2006年10月武汉大学召开“封建社会再认识”的讨论会；2007年10月北京史学界召开“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论坛；2008年12月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召开“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讨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兴趣真是方兴未艾。

一本著作连续三年分别在中国的南部、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文化中心地带引起连锁讨论，在史学界是少有的现象，这事实本身就说明其影响力非同一般。这可能还是开端，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反思，所以封建社会理论问题的重新讨论，其影响力甚于各路金花，必将推动金花的灿烂开放。

二

对“封建”概念的发难，不可避免地要触动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学者的问题，即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因为这一理论本身就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早在百年前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论战，就已摆开两军对垒的阵势，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层峰叠起，仅“五四”前后《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两种期刊发表的文章近千篇，作者多达数百人。

从“五四”到抗日战争前夕的20多年间，有关文化论战的主题不断变换，如中西文化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古史辩论争、科学与人生观论争、唯物辩证法的论辩、社会史论战、文艺自由的辩论、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论争、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大众文学的争论，等等，内容广及社会性质、人生观、东西文化关系、文化遗产，以及历史、文学、经济、道德风尚等一系列问题，像这样的论战20多年达10次以上，而且周期愈来愈短，以1932年为例，唯物辩证法的论辩兴犹未尽，社会史论战趋向高潮，文艺自由的论争又相应而起，这是中国学术界从未有过的纷繁错综的现象。

社会史论战从1927年启动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持续10年之久，在各种思想交锋中，这是历时最长、调子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次论战，当今关于“封建社会理论问题”的复出，是这一论战在沉默80年以后的异军突起，令人倾耳注目。

80年前老一代史学家从苏联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发展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为初级阶段）的五种社会形态发展，从而建立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观。马列主义的信奉者认为中国毋庸置疑地遵循这一普遍规律，按五个阶段循序推进；而论战的另一方则强调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认为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的独立阶段，封建社会也早已瓦解，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五种社会形态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本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见解，但论题一出立即上升到对现代中国革命的认识问题，根据有两点：其一，如果不承认古代中国是封建社会，那就否定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因为近代中国本是古代中国的发展，有封建社会才有半封建半殖民地一说，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前提，否定古代封建，就是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其二，如果中国不存在五种社会发展形态，那就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无异于否认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按照这三段论式，这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出路与中国命运的大问题，因此，学术争论一变而为政治态度问题。

在这场论战中，新思潮派、新生命派、读书杂志派、食货志派等各种学派纷纷登场，国共两党的文化精英、学术界的名流全部上阵，论战多集中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什么性质问题，有主张春秋战国封建论；有认为古代中国属前期资本主义社会；有说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金融资本杂然并存；等等。尽管讨论的双方或持以普遍规律论或强调特殊论，都宣称以唯物辩证法作指导，都以运用

历史唯物论的成果参与论战，然而相互指责，势同水火，差异又在哪里？托派代表人物李季自认为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胡秋原自述，他的马克思主义来自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列宁，他主张的是“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国际主导下的中共，以苏为师，宗法列宁主义，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正统，自与托派的纯正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有区别。按理说，即使有这区别，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同派别，何至于势不两立？所以决定问题性质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政治态度，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这部分人转向国民党，引起共产党人的极大反感，是国际背景和个人立场决定了问题的性质而非学术本身。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处于劣势，亟须在理论上重振信心，火药味愈来愈浓。1931年中共领导张闻天化名刘梦云发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指责对方“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正当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之时，这一上纲使问题的性质一变而为大是大非问题，然而对此定性的并不是学者而是政治家、共产党的领袖。沿着这一思路凡有不同意见者，几乎都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敌我问题。论战的双方原本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讨论的一方如郭沫若、吕振羽既是学问家，又是共产党的革命家，其政治情结，自不待言，即使梁漱溟这样著名的党外人士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自述：“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放，从而追根到其历史，其文化。”怀抱救国救民的愿望从历史中找寻借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同为救国救民，道不同不相为谋，甚至相互为敌，是这一论战的重要特征。

作为马列主义的一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他们都是革命的活动家或领导者，繁忙的工作使他们来不及对其中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周详的学术考察，留下许多有待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共产党取得全国全面的胜利，以无可置辩的现实宣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学者都擢升为主管文化学术部门的各级领导，持续进行路线斗争，特殊论者从此一蹶不振，再无还手之力，普遍规律论者终于以压倒性的优势平息了这一论战。更有甚者，如被批判的哲学家冯友兰表示：“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①有意

^① 《晚年冯友兰，懦弱的哲学大师》，《文摘周报》2009年2月13日。

思的是，社会史论战中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有过相似的表态，要一把火烧掉他过去的著作。这哪是学术问题？是政治绑架了学术！是政治表态而不是在学术结论。

三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文化研究的深入，有的在当初激辩的主题如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大众文学之争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有的如科学人生观、现代化等课题在当今的复出，业已消散了当初的火药味，成为相互切磋的学术讨论。但是，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却一如既往，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叶，历经80年，岁月的激流没有冲淡它的锋芒，如今又重现30年代论战中的那种情绪和冲动，甚至认为这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革命的一种表现。80年的风雨苍黄，依然不改初衷，不得不令人思索社会史论战中贻祸后人的流弊。

80年前被认为反马克思主义一方的共同点，是强调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欧洲模式的特殊国情，如中国封建社会早已瓦解，商业资本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化早熟，社会发展停滞，社会结构具有弹性机制，以及家族伦理，等等。应该说，这些方面都为认识中国国情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某些见解也有失妥当，其中也不乏某些错误或荒唐的论调，如认为中国人“阶级意识不强，种族意识不强，国家意识不强”，“中国不是一国家，而实为一大文化社会”等。这些虽然经不起史实的检验，在论战中已败下阵来，或已得到修正，但对这类问题的否定，并不等于否认中国社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马列主义史学家恰恰在这一点上由于过分强调普遍性而无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留下许多矛盾和薄弱环节。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手过来，正好是事半功倍。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古代。”这本书以会通文献典籍、甲骨文、金文和考古资料见长，在学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最具有中国特征的研究却是为了证实恩格斯的某一结论，而恩格斯对中国古代却一字未提。假如恩格

斯在世，是不是会承认这一成果还是问题！既然恩格斯对中国只字未提，说明他并没有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更没有对中国轻易下断语，这是严谨而科学的态度，也为后人留下研究的余地，而郭沫若标榜自己的著作为恩格斯的续编，在学术上表现的轻狂和浮躁，溢于言表。更重要的是，以笼统的、不分国别的通则，认识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中国古代社会，难道不会发生误导？

应该承认的是，强调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学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确实下了工夫，对国情的认识也抓到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虽然作者长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但是并不等于他们揭示的某些特点就不存在。马列主义学者因为强调普遍性反对特殊性，以致对他们提出的某些特质性问题视而不见，学术与政治不分的倾向，几乎使某些问题成为人们不敢涉足的禁地。

改革开放以来，局面有所改观。当初在社会史论战中，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当代史学著作中已有广泛的吸收和发展，如梁漱溟论证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文化特质，如今几乎成为文化史研究的共识；有关封建社会具有弹性机制问题，在如今已少有异议，而最早提出“弹性”概念的是食货志派的傅以凌；当下对中国古代商业资本的估计虽与陶希圣有所区别，但却吸收了他们的观点。傅筑夫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仅在宋明时代萌芽，从秦汉以来就已屡屡发生而不能成长，你不能说主张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末是马克思主义，而主张秦汉隋唐萌芽说就是反马克思主义！问题是为什么有萌芽而不能成长？自奉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解决这难题。其他如中国文化的早熟性、理性早启、社会构成、宗族性、协调机制，等等，当初被反方提出的问题，很多都被当代学者认同，功在后世这本身就说明价值的存在，当今日之研究者广泛吸收他们往日成果之时，又挥舞出往日置他们于死地的大棒，这是最大的不公，而导致这一不公的依然是政治而不是学术。

“封建”在不同的国情和语境中含义不同，中国史学对“封建”概念存在误读，是毋庸置疑的，在明知误读以后，刻意不改，并不足取。按西方“封建”的使用实际上将中国历史纳入西方模式，按欧洲逻辑进行演绎，这对历史悠久、文化积累深厚的中国实际上是浅薄的。既然在当代中国的话语中，此“封建”并非彼“封建”，概念含混，是科学研究的大忌，因而不断有人提出有必要对“封建”概念进行正本清源，这是合理的要求，也是科学发展的趋势。

反对者有两种情况，一是认为这是社会史论战中反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复辟，殊不知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现代化，强调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与传统社

会主义相区别，其要旨在中国特色，为什么在现实中强调中国的特色和国情，而在古代史研究中却讳言中国特色，再次以普遍性打压特殊性，沿用 80 年前的思路，看待当今之讨论，岂不是老调重弹，重蹈学术与政治不分的窠臼？二是认为，该封建概念在运用中已发生变化，沿用已久，约定俗成。确实，要改变业已习惯的用语，不是易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意见，具有合理性。但学术研究不同于群众用语，首先要有概念的科学性，这是准确判断问题性质的前提，既然西方的“封建”不同于先秦的“封建”，又何必继续沿用这似中似西、非中非西的概念来解释秦汉以来的古代社会。对古代社会性质重新加以概括，提出新概念，本是科学研究应有之义，这对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有莫大的好处，改变沿用已久的误读，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从我们这一代起步，将错就错、贻误后人，岂不是我辈之失职？关键是要以科学通俗的新概念，来取代人们耳熟能详的旧概念，不能操之过急，这需要学术界共同携手，通力合作，分层分别进行，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和理解是最起码的要求。

学术研究本应是集思广益的探索活动，论战的双方只要平等相待，结果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有补益和纠误，是双赢而不该是双输。一度奉行的阶级斗争为纲，使正常的学术讨论异化为打击对手的政治活动。打棍子、戴帽子给学术研究带来累累伤痕。记忆尚未远去，不应该再造新创。学术研究必须跨越政治，突破已经凝固的框架，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请为“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松绑！